

BAOGAO
WENXUE



曹慶文報告文學集

CAO QINGWENBAOGAO WENXUEJI

CAO QINGWEN
BAOGAOWENXUEJI

山东文艺出版社

曹庆文报告文学集

CAO QINGWENBAOGAO WENXUOJI

CAO QINGWEN
BAOGAOWENXUEJI



山东文艺出版社

曹庆文报告文学集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山东泰安市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 插页 249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9—0514—4

I·450 定价5.00元

沃野新禾带露浓（代序）

李新泰

时值初夏，红杏飘香，麦涌金浪。一阵紧似一阵的南风，将麦田涂得越发金光耀眼了。一场接一场的夏雨，滋润得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夏日，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在这暑热的躁动中，孕育着对秋的更大的收获的渴望。

到区县及乡下检查工作回来，已是满天繁星。匆匆冲个澡，便到办公室处理几天来积压的文件。案头上，首先发现了庆文同志这部报告文学集的手稿。处理好公务后，便翻读起这部手稿来。读了几篇，便被作者的艺术功力和书中的人物、故事所吸引，觉得爱不释手，所以就连续打了几个夜战。

这本报告文学集，汇集了庆文同志近年来创作的报告文学的一部分，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一个汇报，一个总结。

这本集子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彩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绚丽缤纷的生活画卷，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现实与艺术交融的特殊的艺术世界里，让我们在这里领略时代的风采，感受时代的脉搏，呼吸时代的清新空气，结识时代的英模人物……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我们的审美联想因接受了新的昭示而得到更广阔的发挥，我们的审美观点因英模人物的崇高思想而得到进一步净化……

从《1928：宋庆龄在柏林》中，我们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那“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艰难的革命历程，看到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坚贞不屈、坚持战斗的革命气概，看到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勇往直前的身影，看到他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革命信念。从《偶闯鄂尔多斯高原》中，我们看到了奇异的异地风光，淳朴的少数民族风俗，令人大发思古之幽情的古迹，使人喝一杯而铭记终生的酥油茶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洁白的哈达。从《便衣警察浴血记》里，我们看到了高大的公安人员的英雄形象，“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他们经历着“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在“风霜雨雪”中“搏激流”，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定，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他们在与罪犯搏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上元胡集走书会》中，我们看到，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勤劳的人民的热情维护下，得以相传至今，并且赋予新的时代的内容。看了这篇，使我们有观看《清明上河图》相似的体会。从《芦苇荡里的秘密》、《第十三张遗嘱》中，可以看到我们新一代的农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在社会主义航道上轻松自如地驾驭着商品经济的驳船，在为国家贡献，为人民造福，而不为自己谋半点私利。从《他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废墟上的奇迹》中，我们看到我们党亲自培养出来的企业家，那种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大家风度，那种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气概。从《吴雁泽的中国气派》里，我们看到我国声乐家拳拳报国的赤子心，看到他们要在意大利学派、法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中挤进一个中国学派的雄心，并看到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艰苦卓绝的跋涉，以及让人们兴奋的已经透露出的一线曙光。从《元老先生传奇》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医学宝库里的瑰宝，看到我们勤劳聪慧的人民，为了使秘方代代相传而经过的传奇般的经历，看到了秘方持有者济世活人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本报告文学集，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努力也是比较成功的，这说明，作者是有一定的艺术功力的，也看出作者对报告文学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报告文学的写法问题。什么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运用文艺手法及时地报道现实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的有新闻性的文学体裁。它是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一种“边缘体裁”。报告文学以其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统一而独立于各类文体之林。它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内容真实生动，文体机动灵活，富有战斗力。它与新闻和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它继承了散文的传统，并由新闻通讯直接演化而来。它是一种在保证新闻性的前提下，运用多种艺术形式——文学、绘画、雕塑、电影等和一切文学手段——叙述、描写、抒情、诗化的意境、各种修辞手段的极为灵活的文学样式。它要求既要有真实性，又要有艺术性，二者不可偏废。

但我们现实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一味追求真实性而毫无艺术性可言，一是一味追求艺术性而拼命拔高、胡编乱造。前者把自己死死框在“真实”的框子里，通篇是材料的堆砌，数字的罗列，过程的叙述，结果的公布，甚至连情节也少见。人物更是只有名字而无动作，无语言，无思想活动。通篇不见艺术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划和颇具匠心的布局谋篇。应该说，这样的报告文学，连篇通讯也不如，其感染力、宣传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后者则脱离开事实，起码在某些重要部分脱离了事实，单纯追求所谓“艺术性”，东拉西扯，无限拔高，将事情搞得难辨真假，将人物搞得面目全非。令主人公看后或哭笑不得，或怒发冲冠，或向隅而泣；令读者看后或大惑不解，或窃而笑之，或嗤之以鼻，或疾笔上告，直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说穿了，这种报告文学，充其量只能算蹩脚的、令人

生厌的小说罢了。

庆文同志的报告文学，既把握了准确的真实性，又调动了丰富的艺术性，在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这本报告文学集中的作品，他都是坚持真实第一的。首先，他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劳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他又尽可能地调动文学手段，来扩展情节，描写环境，刻划人物，锤炼语言，结构谋篇，最大限度地突出人物、事件中闪光的部分，努力体现时代精神，感染读者，以期引发人们的审美联想，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应该说，庆文同志收入集子中的这些报告文学，在写法上做到了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比较成功的。在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及报告文学写作流派中，庆文的作品及写法是有一定特色的。如《刘伶、贾思勰、蒲松龄与徐盛堂的纠葛》一篇，通过酒文化这条崭新的又带有学究气的线索，将历史上与临淄酒有关的名人，与现在的临淄酒厂厂长徐盛堂联系起来，虽然纵横捭阖，大开大合，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但由于真实与艺术水乳交融，掌握了恰到好处的“度”，读来时如小桥流水，时如大江东去，但总是娓娓道来，使之非常成功。

庆文是我市新闻界的年轻人。多年的农村生活，使他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底子；四年的大学生活，又练就了他的写作功力，严格的政治修养，给予他观察生活深刻、敏锐的能力；加上他勤奋好学，不怕吃苦，兢兢业业，为他写作上的丰收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几年来，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山里、湖区，写出大量的新闻作品，不少新闻作品在全国和省里获奖，有的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起到了较好的典型推动作用，并在全国级新闻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业务研究论文。由于他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业务上刻苦锻炼自己，使他的思想、业务都进步很快，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记功奖励。担任领导职务后，在研究管理、组织报道的前提下，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地研究，勤奋地写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热情讴歌，为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鸣锣开道，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着他的聪明才智。

当然，用成熟的报告文学的标准严格要求庆文的作品，有的篇目尚有不足之处。可能是因为工作紧张或时间紧迫，有的篇目还须再锤炼一下，有的篇目尚须更丰满一些。我相信，在今后的写作中，庆文同志会尽力克服的。

匆匆写到这里，窗外已是晨光朦胧，花影树木依稀可辨，晨风阵阵，清气徐徐，令人心旷神怡，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忽然想到今日还要下乡，就此住笔，并以此为序吧！

祝庆文同志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1990年6月11日

（作者为中共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沃野新禾带露浓(代序)	李新泰
1928: 宋庆龄在柏林	(1)
偶闯鄂尔多斯高原	(20)
上元胡集走书会	(38)
山左古杰钩沉录	(48)
吴雁泽的中国气派	(61)
便衣警察浴血记	(70)
第十三张遗嘱	(90)
芦苇荡里的秘密	(105)
亓老先生传奇	(125)
刘伶、贾思勰、蒲松龄与徐盛堂的纠葛	(151)
一分之十二与十二分之一的嬗变	(169)
周毓俊, 你好难为我	(187)
一个有关“速灭杀丁”的故事	(206)
心泽蒙山, 情被沂水	(223)
他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243)
废墟上的奇迹	(261)
山花萌生在黄蒿中	(280)
玉兔正东升	(297)
依稀东风妆碧树(代跋)	(307)

1928：宋庆龄在柏林

四月底的莫斯科，气候还是很冷的。冬日的积雪还没有完全化尽，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风，还不时从这座城市的上空掠过。偶有一日晴暖，表示一下春天已来的信息，接下来便是一连几天近似于冬日的寒冷。

就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发生了一件不太被人注意的事情。东方研究室的华人青年翻译章克先生，辞去了拿着固定工资的让一般人羡慕的工作，匆匆踏上了离开莫斯科去德国柏林的路程。

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又一次看了一眼克里姆林宫，又看了一眼红场，又看了一眼中山大学。这毕竟是他向往的地方，这毕竟是他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啊。这里有他的老师，有他的同事，有他的同学，有他的事业……

但是，他必须马上离开，必须立即赶到柏林，那里有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致使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分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到了莫斯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邓演达于一九二八年初先动身到了柏林。他在柏林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安排好住处后，三月初，派人来将宋庆龄接到了柏林。

四月初，陈友仁收到宋庆龄从柏林的来信，要章克马上离开

莫斯科，到柏林去帮助她工作。陈友仁接信后，马上去苏联外交部交涉，并由苏联外交部帮助章克办好了去柏林的一切手续，章克便马上赶路了。这时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底。

到达柏林后，性急的章克在旅馆里只稍稍休息一会儿，便赶到邓演达先生的住处，要求马上安排他的工作。

邓演达见他这么快就赶到，心里非常高兴。他紧紧握着章克的手，关切地问：

“离开苏联时，遇到过困难和麻烦吗？”

章克笑笑说：“没有。”

“竟这样顺利？”

“是的。因为一切都是陈友仁先生安排的。我个人有一点工资积蓄，因为都是卢布，按他们的规定，卢布不准携带出境，也亏陈先生想得周到，都给我换成英镑了。”

“对这次变动你的工作，有想法吗？”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听从安排，做好工作，让宋庆龄放心。”

“哈哈……”邓演达拍着章克的肩膀，高兴得大笑起来。笑够了，他收起笑容，严肃地向章克交待任务：

“章克，你在莫斯科有工作，也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你又聪明，又努力，本想让你在那里工作和学习下去，直到国内有需要，再让你回去干一番大事业。”

说到这里，邓演达停了一下，两眼望了望章克，语调深沉地继续说下去：

“但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和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远离祖国，到柏林来暂住。在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在照料上热情周到，使宋庆龄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但到了德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点我想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在这里，宋庆龄多次说过，要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此暂住。她的脾气你可能知

道，她不想去麻烦德国政府，更不愿意蒋介石住德国的大使馆来照料她。在莫斯科，自从雷娜·普鲁姆女士逝世后，再也没有贴心的人来照料她，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章克听得直点头，同时也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心里已在盘算着怎样做好工作。最后，邓演达笑了笑说：

“所以，宋庆龄考虑再三，并征求了我和陈友仁先生的同意，决定叫你放弃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学习，到柏林来照料她。你要知道，这项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同样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我们了解你，我们商量的时候说，章克肯定会同意的。”

“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

“你今天毅然决然地来了，我们都很高兴。至于你在这里的任务，主要是照料宋庆龄同志，使她安心在这里居住一个时期。至于你的生活费用嘛！她一定会给你安排好的。”

“不用，不用！”章克着急地说。他本来是来帮助宋庆龄工作的，他只想如何做好工作，并不想给她添丝毫麻烦：“她不必为此操心。因为我得到了北京燕京大学董事会的一笔助学金，足够我在外国住两年的。”

邓演达先生听后非常高兴，接着给章克安排好具体的时间表。

章克的工作程序是：

每天上午早饭后，到柏林大学图书馆，去搜集一切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特别是有关亚洲诸国土地问题的材料。因为这是当前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十一点半左右，到宋庆龄家里去帮助她料理家务。一点半左右，陪宋庆龄到康德大街，到任何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去吃饭。时间之所以安排在一点左右，是为了那时餐馆里的人不多了，因宋庆龄想尽量避免与别人接触，特别想避免与中国的留学生和大使馆的人接触。吃完午饭后，由章克陪宋庆龄去商店买东西。下午，是章克的学习时间，他到柏林大学附设

的专供外国人学习德语的学习班去学习。下午四点后，再到宋庆龄家帮助她整理资料，晚饭在宋庆龄家里吃。晚饭后回家，又是章克的学习时间，学习德语、阅读报章杂志等。

“很感谢给我安排得这么具体，这么详细，谢谢你们 的 关心。”章克说道。

最后邓演达先生一边带领章克向宋庆龄住处走，一边交待道：

“你的住处，宋庆龄同志早已给安排好了，就在她住处附近的一个地方，早餐由女房东供给。”

说着，他俩人便到了宋庆龄住处。

“章克同志来到了。”一进门，邓演达先生马上介绍道。

“我相信你是会来的，章克同志。”宋庆龄热情而又自信地说。

“你在这里好吗？”章克问道。

“好，好极了。”宋庆龄答道。

章克谦虚而认真地说：“我在这里照料你，有什么事情多吩咐就是。”

“今后一切都要听从邓先生的领导，因为他对德国的情况比我们熟悉得多了。哈……”说到这里，宋庆龄开心地笑了起来。之后，又严肃认真地说：

“邓先生正在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目前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你要利用这段时间，多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以供他参考。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非要研究透彻不可。”

“我会努力帮助你 and 邓先生的。”章克说。

宋庆龄继续说：“有消息说，上海同济大学的郑太朴教授，不久就要来柏林的。他这次来，是陪太虚法师到德国来讲学的。这个人在德国上过几年学，对德国很熟悉，曾在德国古定根大学

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他来了，一定会将国内最近的政治情况报告给我们的。”

忽然，正在侃侃而谈的宋庆龄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说：

“听邓先生说过，叶挺和黄琪翔等，也将先后来柏林与邓先生会晤，但行踪及时间也很难定。因为蒋介石已派了人盯上他们，他们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免蒋介石的追踪。”

说到这里，她将手臂重重落在沙发扶手上，满脸愤怒的样子，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之后，章克和邓演达先生就匆匆离开了。

就这样，章克先生按照邓演达先生的安排和要求，每天十一点半左右，赶到宋庆龄的住所，先帮助她料理一下家务，然后大约在一点左右，陪她到康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家中国人开设的饭店吃午饭。宋庆龄很俭朴，吃的也很简单，每天吃的都是一种菜，一种德国人称之为Godeck的菜。这种菜，国内上海人称之为公司菜，就是由饭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菜肴和主食品。一般是大米饭、猪排或牛排，有时也有蔬菜，制作好以后，都放在一只椭圆形的菜盒中。每份一个马克，外加二十分小账。他们两人的饭菜，每次餐费为两马克四十分。当时，一马克相当中国的一块法币。

过了几天，正在吃饭的时候，宋庆龄告诉章克：“近来，邓先生每天上午来我家，向我报告国内的情况，并讨论一些关于民主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民主革命问题。再一件事是，我每隔一天劳驾邓先生一次，让他帮助我学写汉语文章。我可是个认真学习，进步挺快的小学生呢！”

章克听完后哈哈笑了起来。

早在宋庆龄十几岁的时候，为了使她接受新的文明，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就将她送到美国的威斯莱女子大学读书。在

那里，她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对英语尤其熟练，不论讲演还是写文章，全是用英语。但是，要写汉语文章，她就觉得吃力起来。她认为，现在这段相对清闲的时光，正是补习汉语的大好时机。因此，她要求邓先生，每隔一天给她上一次汉语课，尤其是写作课。他认真讲，她认真学，并按时完成邓先生布置的作业。为了尽早提高她的中文水平，邓先生从留德的中国进步学生手中，借来了《向导》、《新青年》等国内出版的进步杂志，把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写的文章作为教材，仔细给她讲解这些文章中引证的典故和一些成语的用法等。她对此非常感兴趣，并经常自动做作业——用汉语写出她要发表的意见，恭恭敬敬地交给邓先生，让他改正。邓先生也毫不客气，认真地指出她在语法、修辞等方面的不当之处。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宋庆龄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后，她每次有意见需要发表时，都是亲自写。有时写了改，改了写，直弄到很晚，她从不让秘书或助理写。后来，周恩来总理对她的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她在写作方面从不熟练到熟练，到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完全是她在柏林时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取得了很大进步，而邓先生对她的帮助也起了重大作用。

过了不久，同济大学数学教授郑太朴终于来到德国了。

这天，章克正在宋庆龄住所帮助整理家务，邓演达先生领着郑太朴教授一步跨进了门。宋庆龄见是郑太朴，高兴得不得了，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倒水，就象见了亲人一样。

“快讲快讲，路上还好吧？”宋庆龄关切地问道。

“还算可以吧！”郑太朴答道。

“国内的情况呢？说详细一点，不要怕耽误时间。快憋死我们了。”宋庆龄迫不及待地问。

郑太朴喘了口气，慢慢地讲了起来：

“国内的情况，现在很难下一个定义。大革命失败后，形势

很复杂。一方面，蒋介石为了搞独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疯狂地对进步人士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各地先后爆发了一些起义。这些起义虽没能成功，但影响很大，使进步人士大受鼓舞，对蒋介石政权的威胁很大。近一时期来，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说到这里，郑太朴教授停了停，看了看宋庆龄和邓演达，加重语气说：

“国内的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先生能早日回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干番事业。”

邓演达看了宋庆龄一眼，认真地说：“我和宋庆龄等同志不会在国外逗留很久的。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总结一下前一段革命（北伐战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这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以致在以后的革命中不再重犯。”

接着，邓演达喝了口水，换了一下坐着的姿势，将他经常和宋庆龄讨论研究的问题，向郑太朴侃侃而谈：

“关于这场革命问题，宋庆龄经常和我及章克讨论。我们认为，我们的革命，同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形势。苏联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但以什么形式来帮助中国，意见还不一致。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倾向于撇开国民党，所以，陈绍禹（王明）公开发表了批评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言论。但也有人主张国共应继续合作，不过持这种主张的人尚不占优势，而米夫这派的主张却占了上风。目前摆在革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拟订一个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纲领。特别是要把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放在革命的主要位置上。”

说到这里，邓演达看了宋庆龄一眼，宋庆龄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他给郑太朴教授倒了杯水，稍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讲了下去：

“北伐战争的胜利，证明了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在中国现阶段

段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没有广大农民的起义，并积极响应和参加北伐战争，仅靠从广州出发的几万名国民党部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的。而农民之所以响应和参加，主要是他们渴望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我和宋庆龄同志正在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相信不久就可以草拟好土地革命的纲领。然后，我们请国内的同志研究并参加意见。特别是谭平山等同志，希望他们多发表意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

“如果研究好了后，还以国民党的名义宣布吗？”郑太朴教授认真地问。

邓演达先生忿忿地说：

“国民党这个名字，原本是不错的。但最近被蒋介石搞得很臭了。所以，今后我们的革命组织，不妨用‘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这个名称，以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行动’两个字，表示决心把三大政策贯彻到底，决不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对三大政策有所动摇！”

说到这里，邓演达先生右手紧握，从半空中劈下来，以表示他的决心。然后，他转向宋庆龄，轻轻地问道：

“宋庆龄同志，你说呢？”

“你把这些日子研究的关于中国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等，顺便和郑太朴同志说一下，也征求他个意见。”宋庆龄还沉浸在对国内问题的回忆和思考里，待邓演达先生询问时，才对他说了这句话。

其实，对中国革命问题，宋庆龄是有一定主见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孙中山挫败陈炯明兵变，回到广州重新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列宁派来一个叫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贝格的人，化名鲍罗廷，到广州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经过与他接触，孙中山夫妇坚定了“联俄”的决心。他们经常一起阅